



来信

4G 时代的竞争

读罢财新《新世纪》周刊2013年第17期封面文章“4G 加速度”，笔者认为，4G 牌照发放加速，是中国移动在3G 时代面临中高端客户持续流失和2G 网络对移动互联应用不堪重负下的一场自救，但想依托4G 重回2G 时代一枝独秀局面，已不大可能。在三大运营商内部竞争加剧的同时，它们更需要面对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等 OTT 应用的挑战。

从3G 发展的情况来看，相比网络的建设，手机终端培养周期更长，对用户选择影响更大。这也是移动必须全力促成今年 TD-LTE 牌照发放的原因。以今年发放牌照来算，TD-LTE 手机在广度（可选品牌）和深度（明星机型）上形成目前 TD-SCDMA 手机终端规模，需要最少一至两年时间。届时，联通和电信3G 用户规模将分别达到1.2 亿至1.5 亿左右，将瓜分移动手机高端用户和中端用户共4 亿人群的三分之二，基本形成三家鼎立的局面。

移动互联网时代，不仅是运营商内部的洗牌，也是整个生态链的变革。运营商主导地位逐步削弱，在管道化趋势下，如何保证自身的利益是更为棘手的难题。

顾军 自由投资者，曾在神州数码任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SBU·市民服务业务咨询总监

户籍改革路线图

从2015年开始，所有大中小城镇，首先向外地大学毕业生开放，然后向有熟练技术又有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开放，再逐步有序地向其他农民工开放

◎ 陈金永 | 文

如何推行有深度的户籍改革？笔者有一个初步构想的路线图与时间表，从2015年开始，用大概15年时间，解决流动人口问题。具体做法是：所有大中小城镇，首先向外地大学毕业生开放当地户籍登记，然后向有熟练技术又有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开放，再逐步有序地向其他农民工开放，最终使所有的流动人口“市民化”，可以举家永久性迁移。

落户名额分配的先后次序

2012年，城镇流动人口（包括大学毕业生）约有2.3亿。粗略推算，到2030年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会达到3亿多。以15年计，平均每年要解决大约2000万人的户籍问题。

每年2000万个名额如何分配？可以借鉴国外吸纳国际移民的做法，参考深圳积分入户的构思，建立一个入户的优先程序：年轻的大学（含大专）毕业生第一优先，然后是熟练技工及稳定的自我就业劳动者，最后是低技术农民工（包含“普工”等）。

这是个先易后难的方案，比较符合中国的情况与财政经济可以接受的能力，以及社会的期望。

大学毕业生是社会福利的主要纳税者，他们落户定居能够产生的社会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。但目前各地对外地

大学生每年吸纳的数目都非常有限，只有深圳在去年通过积分入户的途径，接纳了十几万人（主要是大学毕业生）。

“农民工市民化”在第二阶段。中国的产业要升级，走向高端层次，迫切需要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熟练工人。给有技术的农民工“上户口”会促使大量农民工向技术工人的方向转变。

用七八年时间解决上述两个群体的户籍后，从2023年开始，再集中精力解决其他农民工的户籍问题。

届时，随着总体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，年轻人口逐年递减，教育水平低的非熟练工人会大大减少，加上中国国力更加富强，可以为解决普通农民工户籍问题提供有利条件，为低收入农民工提供更多一些福利。

“市民化”成本能否负担得起

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农民工转户进城成本太大，社会（政府）难以负担。相关研究估算，每个“市民化”的总成本约在8万到10万元左右。以上限10万元，每年大约转换2000万人来算，每年总成本是2万亿元，占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.8%。但这一算法是假定流动人口在一年内把10万元社会福利、公共服务都花光。实际情形不是这样。目前，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7岁-30岁，假设他们的“余生”是40年，即每年要用2500

元。每年要转换2000万人，总成本是500亿元，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.1%，国力应该是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。

撇开数字的讨论，现在大部分农民工都很年轻，对社会福利，主要还是处于付出、缴费，而不是享用的阶段。年轻农民工的社会福利贡献，还可以填补由于户籍人口老化所造成的城市福利财政缺口。更加重要的是，农民工进城工作作为城市创造的“社会产值”，远远超出市民化的成本及他们的工资，他们为城市创造的红利会更高。

户改中的中央政府角色

在户改中，中央必须起主导与推行的角色。目前，户改基本放权给地方，局限在非常小的行政范围内。在许多开放户籍的地方，其政策对象基本只限于本省（市）的农业户口农民工，基本没有触及核心群体即外地农民工；就算对本地农民工放开，很多条件也很苛刻。有些还被扭曲成“农民上楼，政府卖地”的政府工程。

因此，户改迫切需要中央统筹与介入，不能单靠地方有限度的户改。目前，农民工在城市落户遇到的问题，一大部分是广义的生活保障问题，这是全局性的问题，需要中央统筹，不能单靠地方。实质性户改要求打破地域界限，不可避免地涉及各行政区域的事权、财权、人口管理问题，需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统筹规定与执行，中央可考虑成立一个有权有责的户改领导机构，长期专职推行户改事务。

近年来，国务院提出实行“分类户口迁移”政策，鼓励农民工到中小城市落户，最大的40个城市户籍不开放。这是一个误区。

现实情形是：国家的投入主要仍然向大城市倾斜，大部分农民工并没有按照政策往小城镇走，而是按照就业岗位往大城市走；在目前以土地收入为主的

时论

靠提价能解决“打车难”吗

◎ 赵坚 | 文

5月7日，北京市发布出租车调价听证方案，听证会将于半个月后召开。这是北京市政府为解决“打车难”出台的八项措施之一，也是引起争议最多的一项。

北京交通拥堵状况日益恶化是造成打车难的主要原因。提高运价确实可以在出行高峰时段减少出租车司机的亏损，但不一定能挣钱，司机在高峰时段继续“歇点儿”，在非高峰时段拉活儿则可以挣得更多。因此，提高运价无助于缓解上下班高峰期的“打车难”问题。

出租车是公共交通的补充，应大幅增加北京出租车总量。但十多年来，北京私家车增加约300万辆，出租车却维持在6.6万辆左右。要从根本上缓解交通拥堵，应增加拥有和使用小汽车的成本，提高公共交通和自行车出行比重。

出租车提价的另一个理由是，过去7年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增加了60%—70%，而出租车司机收入只增加了15%。这个理由并不充分。在对出租车公司的合理成本、合理收入、合理“份子钱”水平没有认

真审计和明确核算的情况下，不能轻言提价。

此次，北京市还提出，将出租车的特许经营权逐步统一到6年，出租车报废年限由8年改为6年，存量车报废更新时，经营权随之变为6年，这意味着出租车要加速折旧，不仅为出租车公司提高运价提供了合理依据，还会促使出租车公司把加速折旧的成本转移给出租车司机。

北京交通管理部门首先应当对出租车公司的成本收益严格审计，确定合理成本水平。

出租车公司向监管部门报告成本和收入分配情况，政府要对出租车公司的成本、收入和“份子钱”实施监管。政府还应通过引入竞争来提高效率、降低出租车公司的运营成本，并探索出租车个体经营的管理办法。

如上述举措还不能提高出租车司机的收入，理顺利益机制，社会应当接受出租车运价的提高。◎

作者为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

地方财政，地方政府也没有能力开发小城镇，因为小城镇的地卖不出价钱。所以，实质性的户改要同时在所有的城镇推行，包括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特大的城市，因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。

在这户改的15年，我们可以通过检视城镇流动人口的增减，来判断户改的

进度。如果流动人口少了，那就是代表前进；如果增加了，那就是后退。◎

作者为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理系教授，曾担任世界银行、联合国城市化及人口迁移项目的专家顾问。全文详见即将出版的财新《中国改革》第6期